

《学习有理》特别策划“思想的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浙江”⑤

保境东南 传承文明

何勇强

深入学习习近平文化思想

2023年6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任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作了精准概括,认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与和平性。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表现在,即使在国家分裂时期,中华文明仍绵延不绝,得到存续和发展。这一特点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身上体现得非常明显。

吴越国传承延续中华文化的具体表现

吴越国是五代十国时期由钱镠以今浙江为中心建立的一个地方政权。吴越国从后梁开平元年(907)钱镠受封吴越王开始,至宋太平兴国三年(978)钱俶纳土归宋,共历72年,传五主,是五代十国中存续时间最长的政权。

首先,吴越国文化明显具有承唐启宋的特点。吴越国因政治原因没有实行科举制度,但儒学依然得到传承。吴越国王钱镠喜读《春秋》,他去世前留下遗训,里面多处引用《论语》,强调“化家为国”。《钱氏家训》的基调就是儒家思想。吴越国也曾设置学校。蔡襄在《福州修学记》中就说,福州历史上的学校建设是从吴越国开始的。唐末一些士大夫投身钱氏政权,也有一些士大夫如孙郛、韩必、方昊、朱滋等人,隐居乡野,在民间讲学,为吴越国儒学的传承和发展作出贡献。在宗教思想领域表现也较为明显。闻丘方远是吴越国道教思想家的代表人物,他是唐代名道司马承祯的后学,是道教南岳天台一系传人。在佛教文化上,吴越国对传承中华文化的贡献尤其突出。当时北方周世宗抑制佛教,而吴越国三世五王崇佛,各个宗派在吴越国汇聚,得到蓬勃发展。

其次,吴越国文化表现出很强的创新精神。吴越国对中华文化遗产与延续,并不是简单地从唐朝继承,传递给宋朝,而是有变化、有发展、有创新。如在政治制度上,吴越国创设了知机务、通儒院学士、择能院等机构。这种创新在科技上表现得更加明显,如吴越国采用“竹笼筑石”法修筑捍海塘,较唐代的版筑土塘是一大进步,到元代后又被“木桩石塘”取代。从版筑土塘到竹笼石塘,再到木桩石塘,呈现阶梯式进步的趋势。其他如吴越国秘色青瓷既继承汉唐青瓷的传统,又开启了龙泉青瓷的新发展,表现出吴越国文化连珠式传承、阶梯式进步的特点。

吴越国在传承延续中华文化上的特殊作用

在五代十国时期,吴越国在传承延续中华文化上有其他地区政权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首先,尊崇中原王朝的立国之策使吴越



临安博物馆

国与中国主流文化更自然地接近和融合。在五代十国各个政权中,中原王朝实力最强,最后也由中原王朝统一中国,它们代表了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吴越国在政治上实行尊崇中原王朝、保境安民的政策,最后以纳土归宋的方式自行除国,支持宋朝完成国家统一。正因为如此,吴越国在制度上、文化上非常贴近中原王朝。纳土之后,吴越国官员得到留用甚至擢升。吴越文人在宋初文化界有特殊的地位,他们与宋朝主流文化非常合拍。以文学为例,宋初两大诗派,一派尚自然,追求山野;一派尚博雅,讲究辞藻。这两派都有出自吴越国的代表人物。前者如林逋,他祖父曾在吴越国为官,他则成为宋代隐逸诗人的代表;后者如吴越国王钱俶之子钱惟演,是西昆诗体的代表作家。

其次,吴越国文化为中国文化向海洋发展作出了特殊贡献。唐末时,随着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政权崛起并控制西域,陆上丝路受阻,海上丝路开始发展。吴越国在其建立与巩固过程中,一直受到邻国南吴及其后继者南唐的军事威胁。他们切断了吴越国与中原地区进行交往的陆上通道。吴越国只好改走海道与中原维持朝贡关系。然而,这反过来却促进了吴越国航海技术的进步与海外贸易的发展。吴越国时期前往南海、印度洋沿岸的南线航路得到开辟,从那里进口了香料、猛火油(石油)等商品。海外贸易也促进了文化交流,吴越国从日本、高丽找回国内失传的天台宗典籍,促成了五代、宋初天台宗的复兴。当时正值朝鲜半岛后三国时期,高丽与后百济之间战争不断,吴越国王钱镠还曾派遣使者调停双方冲突。在当时北方战乱,中原王朝与海外交往受限的情况下,吴越国部分取代了中原王朝的地位,在延续与发展中华海洋文化上扮演了特殊角色。

其三,吴越国为宋代中国科技高峰的形成作出了特殊贡献。五代十国各政权在文化发展上各有特色,吴越国以科技发展闻名并对后世产生深刻影响。由于大兴寺塔、园林,吴越国建筑技术处于领先水平,产生了

喻皓这样的著名匠师。喻皓曾著《木经》三卷,对宋代《营造法式》影响很深。又如印刷术上,吴越国大批量印制佛经,使杭州成为五代、两宋时期全国的刻书中心。后来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也受益于吴越国印刷业打下的深厚基础。其余如制瓷、造船等技术,吴越国都对两宋施予影响。甚至宋代科学的代表人物沈括,他的曾祖父曾在吴越国为官,沈括是在吴越国文化土壤上成长起来的科学家。宋代时西欧处于中世纪,中国的科技独步天下,达到一个相对顶峰。吴越国在传承中华科技文明上有自己独特的贡献。

吴越国传承延续中华文化的历史原因

吴越国之所以能在中华文明延续中发挥重要作用,主要原因是吴越国文化的发展顺应了中华文化发展的脉动与趋势。

首先是顺应了庶民文化兴起的历史趋势。唐宋时期文化发展的一个大趋势是文化主体下移,庶民阶层在文化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随着士族阶层消亡,大庄园退出历史舞台;同时,随着吴越国商品经济发展,市民阶层也成长起来,与市民文化相适应的园林建筑应运而生。杭州、越州、苏州都兴建了大批园林,傲视天下的苏州园林就发端于吴越国之时。唐宋时期文化主体下移的另一个表现是宗教世俗化、大众化。禅宗与净土宗在吴越国拥有广泛信众,传世石刻文献中留下了很多这方面的资料。

其次是顺应了儒释道文化交融的历史趋势。儒、佛、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三块基石。唐代是中国佛教建立宗派的时期,也是儒、佛、道三家文化交汇融通的时代。宋代新儒学的发展乃至理学的产生,都深受佛道文化影响。吴越国文学家罗隐出身儒士,晚年从闻丘方远学道,他的《两同书》就体现出半儒半道的特点,希望用道家的手段达到儒家所追求的盛世境界。吴越国师德韶在讲法时非常强调佛法服务于现实政治的需要,宣传“天

下太平”与“国王万岁,人民安乐”。他的弟子延寿同时被禅宗和净土宗奉为祖师,主张禅教一致。宋僧智圆主张援儒入佛,他的佛学著作虽完成于宋初,但他是吴越国天台宗山外派的传人,深受吴越国佛教文化的影响。

第三是顺应了唐宋时期中国文化重心南移的趋势。唐末五代时期,北方战乱,大量士人南迁。吴越国地处南方核心地带,在唐末承接了这种区域文化转移,为中华文化的重构作出了贡献。钱镠曾派“鸾手校尉”沿江搜罗北方人才。文献中有很多北方士人南下吴越的事例。

吴越国传承延续中华文化的本质

除了中原地区,吴越国与其他地区的人员流动也非常活跃。由于吴越国实行睦邻政策,来自南方邻国的移民非常多,史籍中有很多福建、江西因乱移民吴越的事例。吴越国丞相沈崧和林鼎都来自福建。在南方诸国的文化交流中,佛教僧侣是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群体。吴越国与闽间的僧侣流动非常频繁,吴越国初期的很多僧人是闽地高僧义存的弟子。不仅佛教,吴越国道教的区域交流也非常活跃。

吴越国与南吴、南唐之间长期互为敌人,甚至不通商旅,但政治上的分裂并未阻止区域文化的交流。甚至与相隔辽远的楚国、蜀国与新兴的契丹王朝,吴越国都与其互遣使节。吴越国文化正是在这样的区域交流与互动中发展起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讲,吴越国文化所传承、所延续的并不仅仅是浙江区域文化,而是这个区域文化的母体——中华文化。

实际上,在五代十国这样一个分裂时期,不仅是吴越国,所有分裂政权都在以不同的方式传承和延续中华文化。它们在文化发展上各有所长,在传承和延续中华文化上也表现出不同特点。如南唐、两蜀富于词章之美,对后世文学影响很深,在宋朝出现了很多文学家。辽朝一方面继承契丹民族传统,另一方面也采用唐朝制度,创造性地实行“一国两制”,为中华文明发展作出别样贡献。他们和吴越国一样,彼此交流,共同作用,推动着中华文化的传承、延续、创新与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也就是中华文明的统一性。这是吴越国传承与延续中华文化的本质所在。

习近平总书记在论述中华文明连续性时特别提到“大一统”。他说,中华文明具有自我发展、回应挑战、开创新局的文化主体性与旺盛生命力。深厚的家国情怀与深沉的历史意识,为中华民族打下了维护大一统的人心根基,成为中华民族历经千难万险而不断复兴的精神支撑。吴越国在五代十国分裂时期,在相对艰难的政治局面中,吸收各种区域文化,延续与传承中华文化,是中华文明连续性与统一性的生动体现。

【作者为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国际留言板

韩国留学生 NOH HYEONCHEOL

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在唐朝和宋朝之间起到了文化桥梁的作用。虽然存在时间相对较短,但因海上贸易的发达,成为对外交流的重要窗口,对东亚的经济和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影响。

这一时期,吴越国与朝鲜半岛也有交流,主要通过海上贸易与后三国时代的高丽和后百济频繁互动。例如,吴越国曾授予后百济的甄壹爵位。此外,通过佛教进行的文化和宗教交流也十分频繁。吴越国与高丽的僧侣们互相交换佛经或共同研究学问。高丽时代的僧侣曇真(昙真)访问吴越国,学习了禅宗的重要元素,并将其传播到高丽,对高丽禅宗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吴越国在东亚佛教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形成了中国、韩国和日本之间的三角网络。

此外,吴越国对韩国陶瓷史也有相当大的影响,早期高丽青瓷的技术特征据推测受到了吴越越州窑技术的影响。当时朝鲜半岛从中国进口了大量的茶具,随着茶具需求的增加,本土化的必要性凸显。此时,后百济的甄壹引进了中国吴越地区越州窑青瓷的生产技术,随后代表高丽的高丽青瓷便诞生了。

由此可见,吴越国以海上贸易为基础,对当时包括朝鲜半岛在内的东亚经济和文化交流产生了巨大影响。

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学院教授吉原浩人

吴越国与日本平安朝曾经展开文化上的双向交流。唐末至北宋的五代十国战乱频发。钱镠建立的吴越国政权稳定,对外交往十分兴盛。

吴越国第五位国王钱俶向高丽和日本寻求在唐末动乱中丢失的天台宗典籍。在日本,日延带回的大量书籍对平安时代的日本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们寻求有关中国新撰写、抄写和出版的书籍的信息。这一时期的海外交流,从中国到周边国家的文化并非单向通行的关系,而是具有双向的特征。近年来,日本对吴越国的研究取得了进展,沈朝子编的《吴越国——十世纪东亚盛开的文化国家》(勉诚出版社,2022年10月出版)是一项重要成果。

吉尔吉斯斯坦留學生 MASHANLO ABDURAKHMAN

我来自浙江农林大学已经三年了,浙江农林大学在美丽的杭州临安,在这里,我了解到了吴越国文化。

吴越国的建立者叫钱镠。他出生在现在的临安,21岁参军,后来当上镇海军节度使,再后来建立了吴越国。吴越国的“三世五王”对杭州的发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为杭州后来成为“东南第一州”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钱镠对他的后代要求很严格,制定了《钱氏家训》,所以他的后代出现了很多杰出的名人,比如钱学森、钱三强、钱钟书等。

如今的杭州已成为世界闻名的城市,吴越国文化也将被世界上更多的人所知道。如果你想到杭州临安来,我可以带你去临安游玩,为你介绍吴越国文化。

我来讲故事

临安博物馆馆长鲍伟华——守好一方文化根脉

我是土生土长的临安人,小时候经常听长辈讲:临安历史上有位“大英雄”,他就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吴越国王钱镠。他既能打仗,又能守一方水土,还会写“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的浪漫情书。对于我们临安人来说,吴越国的那段历史早已具象化为一个个鲜活的故事,值得深入研究。

文化的力量可以穿越千年。《钱氏家训》作为吴越国文化的宝贵财富,至今仍然凝聚着一代代钱氏后人乃至更多的人在各行各业发挥力量。

2018年,我与吴越国文化的交集更深了一步,我成为临安博物馆的馆长。一个区级博物馆,如何能够承担起传播和弘扬吴越国文化的重任?博物馆有钱镠母亲水丘氏墓出土的三件国宝级秘色瓷以及一众吴越国时期的文物,通过人工智能、AR互动、三维影像制作等技术,我们在博物馆打造沉浸式的交互体验,自2019年开馆以来累计接待观众达200万人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千里迢迢走进这里,了解这段历史文化,让我倍感欣慰。



我的家乡“吴越元素”变得越来越多,入城巨大的钱镠雕像、吴越文化公园和正在打造的吴越国王陵考古遗址公园等一批标志性建筑陆续呈现,《钱氏家训》也进入每个临安小学生的教材里,临安作为钱镠的出生地和归息地,正发展成为吴越国文化的传播高地。

现在,我正在为吴越博物馆的新馆开馆做最后的冲刺筹备工作,届时更全面、更立体的吴越国历史文化将呈现在大家眼中。

(本报记者 刘肖言 整理)

苏州大学历史系学生许昕——姑苏城中吴越二三事

我在苏州这座城市里待了许多年,去了许多地方,知晓了许多事情。苏州名园迭出,风景清丽,确实不负叶圣陶先生所记,是“不该错过”的地方。但要问苏州历史上最大的一处园林——南园,则不得不叹息:它已经和它的主人钱元璩一道,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之中了。

钱元璩,字德辉,是吴越国王钱镠之子,也是当时的苏州刺史、中吴建武军节度使。他的儿子钱文奉,也继承了父亲的职位,两人共在苏州主政了一个甲子。钱元璩父子在位的这六十年里,称得上是苏州发展的黄金时代。

除却上文提到的南园,跨越千载,吴越国依旧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园林遗产和文化遗产。因宋徽宗偏爱其中的花石而败落的南园,其东南角成了苏州府学的一部分,又为现在的苏州中学所继承;钱文奉精心营造的东圃,如今也是苏州大学本部所在地。历史种种巧合,不由得引人遐想。钱氏父子手下的宾幕“丁陈范谢”,子孙皆至大官,甚至有如范仲淹般惊才绝艳之辈。自北宋以降,苏州文脉繁盛、人才辈出,或许与之相关?

苏州人郑直在《吴中水利书》中盛赞吴越国时期的农田水利工程,并以此为蓝图着



手治理两浙地区的水患。太湖平原地势卑湿,水网稠密,而聪明的钱氏父子反而以此为依托,修建堤岸,置闸开闭,建立起一套兼具抗御旱涝和便利排水的塘浦圩田系统。此后的一千年来,太湖的农业景观基本以圩田为主,直至近代工业化和现代化后才开始逐渐消失。

我们的城市有许多的历史记忆,我们的文化有生生不息的力量。千百年后,人们依旧能透过历史的刻痕,回忆起那个璀璨的吴越国,品味我们内心深处的文化自信。

浙报制图:陈仰东

杭州市上城区“红巷新声”宣讲员何嘉成——更好地把吴越文化传承下去

我是一个土生土长的“上城人”。历史上杭州作为都城,开端于吴越国;杭州城市风貌的初现,始成于吴越国。而上城区作为吴越王官的所在地,更是吴越文化的重要承载地。

我儿时关于吴越文化的印象,更多是停留在书本上。钱镠王从临安白手起家,铸下“一剑霜寒十四州”的宏图伟业;吴越国的三世五王,凭借“射潮筑塘”“三筑杭城”“疏浚西湖”“富甲东南”“善事中国”“纳土归宋”等文治武功,成为杭州历史的高光时刻。

2003年,时任浙江省委书记习近平同志在《加强对西湖文化的保护》一文中指出,西湖的周围,处处有历史,步步有文化。对这些历史文化遗存,我们一定要保护好,利用好,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杭州既有吴越文化、宋韵文化的千年文脉,又散发着阔步迈向现代化、国际化的生机活力,如何在保护发展的同时让历史立得住、叫得响、传得开,是需要我们潜心思考、努力破题的方向。

近年来,上城区坚持打造文化传承标杆区,以杭州“城市客厅”的定位,打好文化保护、传承、创新“三张牌”,特别是依托韵味百巷工程、Citywalk沉浸式体验游等新思路、新形式、新举措,加强遗址保护、擦亮文化标识、赋能文化活动,不断提升吴越文化的辐射面和影响力。现如今,在杭州,漫步西子湖畔,钱王祠、孔庙、雷峰塔等吴越国胜迹星罗棋布、串珠成链;徜徉钱塘江边,六和塔、白塔等吴越国时期的建筑杰作,依旧是游客青睐的“打卡地”;走进江南红巷,在全国首批“科学家精神培育基地”之一的钱学森故居中,蕴含着智慧之光和品格薪火的《钱氏家训》,更是吸引着许多参观者驻足品读……

我想,我们应该坚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理念,更好地把吴越文化保护好、利用好、传承好。



1 **雕版印刷:**唐末战乱频仍,《大藏经》有缺失,钱俶特致书日本,奉黄金五百两,求写真本,抄得后雕版刊行。浙江多处考古发现了钱俶时刊印的《宝篋印陀罗尼经》,有显德三年(965)刻本、开宝八年(975)刻本。《陀罗尼经》经卷,全长二点一—米,有礼佛图,有经文,共二千七百多字,共造此经八万四千卷。

2 **航海贸易:**《旧五代史》卷一三三《钱佐传》说吴越国“航海所入,岁贡百万”。足见其航海贸易规模非同一般,在五代十国当中,堪称航海大国。

3 **瓷器:**20世纪末期以来,在印尼爪哇海域发现了两艘年代分别为10世纪中叶和10世纪后半叶的沉船——印坦(Cirebon)沉船和井里汶(Cirebon)沉船,出水了大量中国瓷器。在井里汶沉船发掘登记的7309件瓷器中,越窑的产品约占20%~30%;在井里汶沉船出水的中国瓷器中,越窑青瓷占了绝大多数,数量应逾30万件。

雕版版片 杭州市文化馆供图